

本书将语用学理论和译学理论有机结合，以语用意图为切入点，将翻译视为跨文化语用行为，重新审视了翻译的本质、翻译过程和翻译评判标准，力求使跨文化交际活动在“和而不同”中不断地发展，为解决现实翻译问题提供突破口，适合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者、翻译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使用。

Translation Criterion Revisited: A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 Intention

翻译标准的语用学研究

林继红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翻译标准的语用学研究

林继红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标准的语用学研究/林继红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615-5387-9

I. ①翻… II. ①林… III. ①翻译-语用学-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2307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 xmup@xmupress.com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 × 1000 1/16 印张:15

字数:300 千字

定价: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本书为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翻译的
言语行为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2014B078)及福州大学科研启动项目
“翻译标准的语用学研究”成果(项目
编号:13SKQ16)

序

历史的车轮驶入 21 世纪,人们对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不再有陌生之感,而且愈加深刻地感受到其重要性、必要性和启发性。

翻译跨学科的根本性质,使得翻译研究必然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理论养分,从不同视角进行学科解释、补充与丰富,使其兼收并蓄,不断完善。作者从语用学视角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以语用意图作为突破口研究翻译问题,这一定位别具一格,新颖独特,既谈语用又论翻译,视野开阔,分合有致,写作风格明白晓畅,可读性强。

关于本书的创新点和价值,我想应该主要由读者去评价。在此,我主要谈谈阅读书稿后的一点体会。

首先,绪论的文献综述具体到位,思想丰富,逻辑性强,体现了作者对文献的收集和解读梳理比较全面深入,反映了作者具有扎实的文献基础。

其次,作者把语用意图作为语用学与翻译的契合点,对翻译本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进行再认识,无论对开阔译学研究视角,还是对拓展当代语用学应用范围,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语用行为,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语言的本质在于其意向性,语用对等的实质在于施为性对等,体现了该研究植根于语用学和对译学研究现状与进展较全面的把握。

再次,作者提出了言语行为分类的整体性原则和层级性原则,以及与交际语境、语义多向度和表达自由度相关联的三个标准。在此基础上,将语用意图的表征划分为言实、言情、言理三大类,体现为聚焦性单一意图和离散性综合意图,进而分析了语用意图表现的语境依附性、逻辑性、整体性以及层次性、顺应性、稳定性和未来指向性等特征。这些分门别类的条分缕析充分体现了选题的创新性。书中提出了聚焦性单一意图和离散性综合意图的话语特征及翻译原则,并以大量实例加以应用与分析,说明作者提出的这些原则具有指导翻译实践的应用价值。

该书为语用学在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上的进一步介入,作出了富有创意的尝试与探索。综观全书,既不乏个人宏观学术思考的闪光点,也有精雕细琢,针对译例的微观分析,其研究成果的独到之处相信能给读者带来一定的

启迪。

最后,我想进一步提醒作者的是,眼下这一新成果只是某一学术专题探索的一个阶段性小结,因为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是终结性的“绝对真理”,而是由此及彼,逐层推进,打开更广阔天地的新起点。我相信,作者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定能催生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是为序。

林大津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4年7月于榕城

PREFACE

前言

在不断强化译者主体性的背景下,有没有评判翻译质量的标准?

如果没有,广为人知的韩素音翻译比赛如何开展?

目前国内出现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苗头,倘若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有部分译者或将译者意图或将委托人意图而不是原作者语用意图作为评判标准,或对意图和意义、目的、功能等概念区分不足。就国内外翻译研究而言,虽略有涉及语用意图翻译观,但深入研究暂付阙如。鉴于此,本书在语用学翻译框架内,结合言语行为理论、诠释学理论、言语交际理论、广义修辞学等相关理论,采用对比分析、跨学科分析、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等方法展开研究,对翻译标准进行再审视。翻译活动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各种文化之间信息资源的传递与共享。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源文信息可以任意篡改,其结果必然会影响甚至破坏文化交流。

尽管结构主义译学范式与解构主义译学范式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影响,但是文本显然不是脱离外部因素而独立存在的自为性客体,结构主义译学范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翻译“人”性的缺失,作为翻译活动本体理论尚有缺陷;解构主义译学范式对译者主体性的一味追求同样意味着对作者意向性的排斥,难免造成对文本意义客观性的最终否定,使译作失去客观有效的标准,因而失去翻译理论本体框架就不足为奇了。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继而对文化研究情有独钟,使翻译研究在语言本体的轨道上越滑越远。面对结构与解构的交锋,研究发话人意图的语用学视角的介入有可能使翻译活动步入“和而不同”之路。

语用学和翻译的联姻可以使翻译获得更强的解释力。它不仅给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关研究的宏观理论,而且还可能提供微观的语言学分析方法。当翻译活动成为语用学的体现对象之后,翻译研究就可直接成为探讨译者解读原作者意图及传递原作者意图的一门学问和实践。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语用行为,把翻译视为一种言语行为,这实际上就是将行为观念结合译语“以词做事”和“以言行事”的力量去调整翻译对等判断的标准。

那么翻译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对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再认识?通过言语

行为理论和翻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性链接,可以得出:翻译中语言的本质在于其意向性,翻译中语用对等的实质在于施为性对等,而不是成事性效果对等;翻译作为跨文化语用行为,其交际成功的必然标志不仅要看“说话人意义”是否得到传递,更要看译者的翻译结果是否符合说话人的意图。翻译作品在召唤译者解码言语行为的能力,源文话语所作的就是通过其话语意图引导译者自己去建构言语行为,邀请译者以读者的身份参与译文话语构建的世界蓝图,源作者的话语施为性功能是在译者的能动作用中恢复的,但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直接来自译者对源作者话语施为性功能的补充和反应,否则这一轮言语行为就会终止。

言语交际的失败或误解的产生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未能理解言说者的交际意图。沿着“语言意义—话语意义—语用意图”这个言语交际信息载体,书中对语用意图进行界定并指出:语用意图是借助交流来实现的特殊的、有目的的意图。语言功能和言语行为不是一回事,功能与行为的区别在于立足点的不同:功能的关照点在于“做了什么”;行为则从语用用意的角度出发,用语言来“做什么”。人类利用语言符号进行交往,首先是语言单位的意义,其次是在语言意义基础上的话语意义,再次是在话语意义基础上,在语境的作用下,体现说话者言语行为的意图。这一分析给翻译实践带来启示:对语用意图传递的信息采取分类的量化,可减少效果的模糊性,而且有助于更具体地分析和把握译文效果。

为确保分类的有效性,书中提出言语行为的分类原则和标准。分类的两个原则为:(1)整体性原则:该原则以“完形”理论为依据进行思考。(2)层级性原则:该原则是基于“组合与聚合”和“系统与结构”等思想引发的,这一原则保证了言语行为类型中“类”的定位。分类的三项标准为:交际语境、语义多向度和表达自由度,这三项标准是再结合言语行为类型的内部结构和外部条件而提出的。据此原则和标准,可将语用意图的表层性区别特征粗略划分为言实、言情、言理,还可进一步在深层结构中,划分出聚焦性单一意图和离散性综合意图。语用意图总体上表现出语境依附性、逻辑性、整体性、层次性、顺应性、稳定性和未来指向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结构与解构包含翻译的人文性和社会性,决定了译者的任务是通过源文的施为用意这个“强力粘合剂”把源文和译文整合在一起,从而使翻译完成一轮完整的言语行为。在对翻译中语用意图的理解与解释、表达与接受进行探讨后可得出以下结论:翻译中对语用意图解释的过程就是特定的意向状态在特定的语境中外化为语言表达的过程,而理解的过程则是语言表达在特定的语境中内化为意向状态的过程。翻译过程并不仅仅是对源文的理解与解释,

更是源文文本话语“施为”触发和译文文本话语不断构建走向“施为”的过程。语用意图的理解意味着对表达者语言有效性要求的证明以及接受者对有效性要求的认可。翻译言语行为语境的运作过程实际上是各个语境要素不断调配、整合并不断把新的意义和指称要素引入的过程,而语境要素的整合、新语境要素的引入以及新意义的生成等,归根结蒂都要通过文本意向网络构建新的语境来完成。换言之,语用意图含蕴于并受制于语境,特定语境之所以能够含蕴不同的意向,乃是因为话语意图也是语境要素,但它与其他语境要素有着实质性的不同,在语境中居于驾驭性和能动创造性的地位。翻译中一切理解与解释的行为正是通过其言语行为语境把特定的源文文本意向内化到求释者的意向网络中而得以实现的。

接着本书提出聚焦性单一意图的理解模式(即数量原则 $\longleftrightarrow$ 关联性 $\longleftrightarrow$ 质量原则 $\longleftrightarrow$ 关联性 $\longleftrightarrow$ 语用意图)。聚焦性意图的实现过程并非任意的,而是在意向网络与诸多语境要素相互融合与整合的过程中实现的,因为“追问提问者及其用意”的本质就是要寻找两个或多个语境要素之间的理解性关联,而这一关联是在不断地把相关信息因素引入到语境中(以达到一定的话语信息量)实现的。

同时指出离散性综合意图的审美图式特征:这一整体图式中可以加进个体获取的新经验以包含更多的变量和特性;图式本身又蕴含着子图式,可以在不同的经纬度上表征知识和经验;图式在接受信息时处于变化之中,当输入信息表明需要重构时,图式可以被重组。这一整体图式是对语用意图具象性的、体验性的整体把握,具有多维的向度,融入各类信念、情感、概念与理解等体验和知觉表象,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

本书最后提出聚焦性单一意图和离散性综合意图的翻译原则,并以大量实例进行应用分析。单一聚焦性语用意图的可阐释空间相对封闭,译文以是否符合源文所体现的单一性意图为标准;聚焦性意图既可能是译元的规约意义(语义层),也可能是译元的短路会话隐含(语用—语义层),还可能是译元的会话隐含(语用层),因此要明确聚焦性意图的关联性具体体现在译元推理的哪个层次;综合离散性语用意图由于较多涉及价值评判和价值主张,在强调源文本意向性基础上的可阐释空间相对开放,因此强调译文的语用理据性及其所发挥的人际协调功能,以尽量定位离散意图主基调为翻译原则。语用意图具有单一聚焦性时,源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互动的结果偏差较少。语用意图具有综合离散性时,随着语篇分析量的增加,源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应该更有可能开拓广义对话的空间。

所谓翻译标准,不应该是对译者或目的语文本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源

语文本的规定,而应该是译者在聚焦性单一意图和离散性综合意图的传递过程及其结果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跨越源语文本的描写与规定。

总之,本研究体现了一种跨学科理论的解释力。本书的观点不是要否认更不是要替代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而是旨在补充和促进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发展。

本书的雏形是我的博士论文“翻译标准再审视:语用意图观”。成书之际,特别要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首先感谢恩师林大津教授,感谢他在论文选题和构思、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点,以及他在初稿形成和不断修改的过程中所倾注的心血。其间无不凝聚和折射出导师对学子的热忱关怀和教诲。导师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宽厚仁慈的胸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使我受益终身。他的教诲与鞭策将激励我在科学和教育的道路上励精图治,不断创新。如果说该书有独特视角和可取之处,那都是导师无私教诲的结果。值此出版之际,承蒙导师拨冗赐序,更是不胜感激。

衷心感谢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陈维振教授、刘亚猛教授、王丽丽教授、李荣宝教授。他们在我读博期间始终给予关心与指导,他们的指点与帮助,使我受益匪浅。

特别感谢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小慰教授的一直关心与支持,感谢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各位领导和同事,感谢他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谭学纯教授和沙平教授、福建闽江学院汪敬钦教授等给予的学术启发和宝贵建议。感谢所有从精神上、学业上、工作上和事业上关心和支持我的人。

感谢本书引用的所有资料和文献的作者,他们的成果是本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养分。

感谢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经费和福州大学发展科技启动基金的资助以及外国语学院提供的出版资助。

最后我要感谢我家人的支持,他们的爱和亲情给予我心灵的平静和前行的力量,相信此书的出版也是对他们的爱的最好回报。

书稿即将付梓,然终因才疏学浅,留下不少有待改进的空间。科研无止境,我当继续努力,争取新成果。

林继红

2014年6月于榕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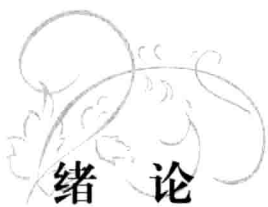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 录

前言

绪论	1
第一节 意图性翻译综述与思考	1
第二节 选题缘由:语用学翻译的呼唤	12
第一章 翻译“在途中”:翻译标准再审视	15
第一节 翻译的“结构”与“解构”之争	15
第二节 争端的解决路向:语用学和翻译的联姻	23
第三节 融合与超越:语用意图翻译观	26
第二章 语用意图翻译:理论基础	32
第一节 言语行为:意义观概述	32
第二节 言语行为理论与翻译理论的链接	50
第三节 言语行为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59
第三章 语用意图解读:界说、分类与特征	70
第一节 言语交际:语用意图界说	70
第二节 语用意图分类:聚焦性单一意图和离散性综合意图分析	79
第三节 语用意图特征	98
第四章 语用意图翻译:理解与解释	109
第一节 翻译中的语用意图:理解与解释	109
第二节 翻译的言语行为语境	122
第三节 语用意图理解:语境的建构与重构	127

第五章 语用意图翻译:表达与接受	135
第一节 翻译表达:语用与修辞的互动	135
第二节 语用预设:语用意图表达与接受的前提	138
第三节 选择与顺应:语用意图表达与接受的修辞化	140
第四节 语用意图翻译:译者与读者	148
第六章 语用意图翻译:应用与分析	154
第一节 聚焦性单一意图翻译:原则与实例分析	154
第二节 离散性综合意图翻译:原则与实例分析	170
第七章 结论:管见与展望	212
参考文献.....	215



人类意识到言语交际活动中传递语用意图的重要性可谓历史久远。早在先秦诸子时期,《庄子·外物》篇载有:“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语是用来达“意”传情的,言者“言不见饰”,听者领会了就得“得意忘言”。《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又云:“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其弦外之音是以言观“意”,倘若听话者只听说话者的话语表层意义,而不挖掘其深层意图,那就有悖于真实的话语意图。

中国古代传译也间接提到说话者意图的传递问题,这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礼记·王制》篇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味、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堤,北方曰译。”战国时期,华夷统一,族类与文化并重,各民族之间通过“象寄之才”(即翻译人员,笔者注)“达其志,通其欲”。

三国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也说道:“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厥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①这段引文告诉我们,虽然“言不尽意”,但是“意在言中”,传授天竺佛经时虽要通俗易懂,但万不能失去佛经里所要造化人们的种种意图。

第一节 意图性翻译综述与思考

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到今天,已出现百家争鸣的景象,从等值学派、解构学派、阐释学派到文化学派,学者们对翻译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

^① 罗新璋,陈应年编. 翻译论集(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2.

管各个流派对翻译研究各持己见,甚至有时针锋相对,有趣的是,他们在阐释各自的基本翻译思想时却不约而同地、跨越时空地流露出意图之于翻译的重要性,在看待翻译“原作者意图”的观点上竟然如此一致——即便只是“点到为止”、“浅尝辄止”。

我们发现,在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忠于作者与忠于读者、源文本至上与译文文本至上此起彼伏的论争中,西方译界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意图性之于翻译的影响——尽管关于语用意图翻译观的陈述还不够明晰、不够明确。让我们打开西方翻译史案卷,搜寻关于“意图性翻译”倾向的一些论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全书下同):

(1)马卡斯·图里尔斯·西塞罗:我认为没有必要字当句对地翻译,但我保留了原语的总体风格和语力(force in language)。^①

(2)沃尔特·本雅明: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对接受者的考虑从来都不证明是有效的,同一个事物不是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而只是借助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意图:“纯语言”。^②

“译者的任务就是发掘作用于译语语言的意图效果(intended intention)”,以便在译作语言中创造出原作的回声。这个意图的传递需要通过纯语言来完成。^③

(3)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要忠实于原作思想,往往需要偏离原作的笔调,但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因笔调而偏离思想,也不能只顾译作文笔的流畅和优雅而牺牲原作的思想和笔调。^④

(4)彼得·纽马克: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分析文本意图、译者意图、文本的场景和读者以及文本的权威与书写的质量。^⑤

“翻译中的不变的因素与可变的因素完全取决于语篇意图。……译者应

① Robinson D.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50; Douglas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M].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25.

② Benjamin W.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C]. //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8-21.

③ Benjamin W.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C]. //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8-21.

④ Tyler A. F.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120.

⑤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0-21.

根据语篇的意图作出自己的决定。”^①

“通常译者意图和源文作者意图是一致的。”^②

译者要注意“文本意图”(the intention of a text)——原语作者对主题事物的态度,例如,对同一事物的描写,不同的人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或怀疑、或深信、或讽刺、或赞扬等。^③

(5)玛丽·斯内尔·霍恩比:“文本是译者以读者身份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再创造地传达给另一个文化读者群的语言表现。”^④

(6)杰里米·芒迪:“译者的任务就是发现趋向目标语言的特殊意图。”^⑤

(7)巴兹尔·哈蒂姆和伊恩·梅森:“意图在正常情况下其重要性要超过信息内容。”^⑥

西塞罗是西方翻译理论的鼻祖,著名演说家、修辞学家,主张翻译在交际功能上求得双语的对应或统一,为此目的语可以诉诸形式上的破格,但无论如何,作为“协调者”和“阐释者”的译者必须保留原语的“语力”,他说的这个语力其实就是“语用意图”。可以看出,西塞罗的论述中已涉及翻译要重视原作者“语用意图”这一思想。其实,早在古希腊就已普遍存在着“言语是有目的”的观点。^⑦

本雅明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鼻祖,主张翻译本身要“存异”而非“求同”,提出译者要摆脱源文的束缚,充分发挥自主性,对源文进行创造性阐释,使原文获得“来世(afterlife)”。本雅明和其他解构主义者一样,颠覆了译者和原作者的等级序列,给予译者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有趣的是,他却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任务是“发掘作用于译语语言的意图效果”。这里的“意图”含有作者意图和译者意图,虽然更多时候将译者意图置于作者意图之上,但至少已将“意

① Newmark, P. About Transla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33.

②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2.

③ ibid.

④ Hornby, M. S.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Intro, 1988: 2.

⑤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 [M]. London: Th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1.

⑥ Hatim B. & Manson. I.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37.

⑦ Vermeer,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图性”介入翻译中。

西塞罗和本雅明是西方翻译史上两种迥然不同的翻译方法代表,他们所代表的是翻译理论上“最根本的两极”^①,然而,他们对翻译的阐述中却都蕴含了古朴的语用意图思想,只不过当时没有语用意图这一说法罢了。

泰特勒“翻译三原则”指出,虽然译者对源文有略加增减的自由,但增补内容必须“与原作思想有必不可少的联系,并实际上能加强原作的思想”,而删减内容则应是“明显多余而又有损于原作思想的东西”。^②当谈到文化冲突对翻译的影响时,泰特勒认为“忠实与否不能根据词语是否在形式上与源文排列一致来判断,而只能从功能上看译文是否为预期读者所接受^③”。可以看出,其论述已蕴含“译者依据原语的思想意图来调整翻译策略”的思想。

尽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的西方翻译研究留下丰富的研究遗产,但毋庸讳言,基本上是“随感的、经验式的、不够系统的”^④。20世纪60年代,奈达“科学”的翻译使研究发生根本性转变,翻译理论与探讨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有趣的是,仍然能发现各学派强调译者要注意“意图性”翻译的痕迹。

我们认为“对等论”代表人物之一的纽马克还是相当重视原作者意图的,要不然何必强调“通常情况下”译者意图和源文作者意图是一致的呢?应该说,在潜意识里他已经把原作者的意图视为翻译的标准,翻译中的一切“变异”以此为宿命。如果译者意图和原作者意图存在差异,那么这里的意图概念和目的论中的“目的”和“功能”概念几乎等同。例如,译者翻译某个语篇只为告诉译语读者源语语篇的语体风格,而不是为传递源文内容。不过,纽马克的“文本意图”这一说有待讨论,因为意图是一个心理概念,文本是不可能有意图的,纽马克并没有给“意图”一个明确的概念,让人莫衷一是。尽管如此,纽马克对翻译原作者意图或原语意图的重要性已流露于笔端。综合学派霍恩比同样强调译者要关注作者意图的传递,芒迪提出译者要善于挖掘趋向目标语语言的特殊意图,还有语言学派哈蒂姆和梅森也相当关注翻译中的“语篇意图”。

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

笔者认为,答案应该为“不是”。

① 许钧. 对翻译的历史思考——读《从西塞罗到本雅明》[J]. 上海科技翻译, 1999 (3): 1-4.

② Tyler, A. F.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22.

③ Kelly, L. G.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209.

④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增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8.

1. “目的论”意图观

“目的论”的核心概念是: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它源于冯·赖特的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据该理论,行动特征在于其意向性,如果我们赋予同一行动不同的目的或意向,它就成为不同的行动。因此,翻译特征就在于其意向性或目的性。如果我们赋予翻译不同意向或目的,那么面对同样文本,译者根据不同翻译目的就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创造出不同的译本。例如,面对委托人意向或目的意图,译者就会采取不同翻译策略,创造出符合委托人意图的不同文本,即便该文本可能与原作者意图不同。在“目的论”框架中,任何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都有一个目标(aim)(指为动因通过行为手段所言达到的最终结果)或一个目的(purpose)(指实现目标过程中的临时阶段),都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这符合冯·赖特对任何行为界定都会涉及意图性的道理。

在这种解释下,“翻译作为一种有意图的互动”,首先是意图改变现有事物的状态,也可能是告知目的语受众有关源语作者所要表达的交际意图。“意图”(intention)被认为是文本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以目标为取向的方案或行为”,旨在寻求创作或理解文本的恰当方式,可等同于行为的功能(function);“功能”则是接受者眼中(希望)文本所表达的用意,即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①但这只是文本层面上的意图和功能,还须考虑语言外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干涉。

赖斯认为,文本可以有一种或多种意图,多种意图也可能具有同样重要性,但通常情况下一意图占主导地位,通过作者在文中表述的意图,文本被赋予了交流的功能。如果能确定所译文本类型和体裁,以此确立翻译意图,对译者来说大有裨益。^②借鉴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他将文本分为内容为重(content-focused)的信息型、形式为重(form-focused)的表达型和诉求为重(appeal-focused)的操作型文本,提出语篇类型决定具体的翻译方法以及文本功能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即“评价译文主要看其是否传达源文主要功

①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8.

② Reiss, Katharina.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 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 [C]. //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60-171.